

随园·编辑出版学博士文丛

编辑对上海沦陷
时期文学的影响

石晶晶 / 著

被编辑的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编辑对上海沦陷
时期文学的影响

石晶晶 / 著

被编辑的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编辑的文学：编辑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影响 /
石晶晶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308-14882-5

I. ①被… II. ①石… III. ①编辑工作—研究—上海市—现代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0460 号

被编辑的文学

——编辑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影响

石晶晶 著

责任编辑	葛 娟
文字编辑	杨利军 陈 玥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22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882-5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本书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资助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随园·编辑出版学博士文丛

—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生产与话语空间	16
第一节 上海沦陷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文人心态	17
第二节 文学编辑主导下的以期刊为中心的文学生产	21
第二章 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题材的选择	29
第一节 以“日常生活”题材回应时代的书写	30
第二节 通过女性主题的写作延伸文学的日常性	36
第三节 借谈古人论古事读古书以逃避现实	42
第三章 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题材处理角度及方式	48
第一节 雅俗共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重新选择	49
第二节 乱世佳人：以女性视角表现上海都市生活	60

第四章 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特定文学体式的盛行	70
第一节 散文文体的大力推行	71
第二节 引导与规范报告文学的创作	84
第五章 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的读者接受	95
第一节 上海读者的文学期待与编辑的文本策略	96
第二节 文学编辑组织剧评以引导受众、推动创作	107
结束语 被“编辑”的上海沦陷时期文学	117
参考文献	123
附录 上海沦陷时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编辑出版大事记	131
索 引	141
后 记	145
评论文章	147

—→ | 绪 论

一、“文学编辑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研究综述

“编辑”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二是做编辑工作的人。对资料进行提炼与现代意义上的“选题策划”类同，对现成的作品整理、加工则是技术层面上的编纂校对。文学编辑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体现在编辑思路与编辑行为所引致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文学刊物、文学流派乃至文学史发展的影响，以及“编辑者”个体或群体作为出版者、作者、读者沟通的中介在现代文学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这些不可避免地受政治时势的影响、文化市场的调控、社会的审美取向以及编辑个人的思想意趣息息相关。绪论首先就“文学编辑对现代文学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作出阶段性的梳理，指出“编辑学”视域研究的先进之处与目前依旧存在的不足以及可供挖掘的广阔空间。

在卷帙浩繁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学界对现代编辑群体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水平参差不齐，“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繁盛景观

极不相称”^①。早期最常见的论述体现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物——尤以期刊为主——的研究中,其中零散地涉及编辑思想、方针、策略等对刊物发展的作用力。比如王德禄、吴三元《关于胡适与〈新青年〉关系的一点考证》^②从史料出发,质疑了胡适发表“不谈政治”声明,试图篡改《新青年》编辑方针这一“阴谋”的真相,表现出学术公正的姿态。沈卫威在《从〈新青年〉到〈新潮〉——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③一文中由《新青年》和《新潮》《国民》为切入点,对“走出传统角色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情形作了精辟分析,洞察到编辑人之间政治倾向与文化倾向差异对社会历史走向产生的不同意义,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朱晓进在《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④中指出作为30年代特有现象的“杂志年”,是由当时的文化控制与反控制这一政治文化背景造成的。政治文化心理驱使下的普遍的阅读需求促使编辑自觉修正了自己的办刊方向与登载原则,读者需求的导向作用与编辑引导的职业意识成为一对有趣的作用力。

另一类相关研究是在论述文学流派形成与发展时谈及作为“阵地”的出版物。比如王强的《关于“新月派”的形成与发展》^⑤、马以鑫

① 刘保昌:《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群体》,《学术论坛》1999年第5期。文章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编辑群体的人员构成、编辑策略、编辑素质与变动的主张,认为该群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② 王德禄、吴三元:《关于胡适与〈新青年〉关系的一点考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③ 沈卫威:《从〈新青年〉到〈新潮〉——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④ 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⑤ 王强:《关于“新月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的《〈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①、高恒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②都揭示了报、刊的编辑、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些对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类研究成果很多,不一一列举,但需要指出的是关注重点通常是出版物的撰稿人——文学流派的中坚力量,编辑出版行为则往往作为技术层面的操作而被忽略。诸多的现代文学大家如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编辑工作上,但在早期研究文章中“编辑作家化”的倾向尤为突显。虽然身兼多重角色,但塑造典型的文学家形象仿佛才是正道。这与“编辑学”的长期被忽视有重要关系。早在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曾出版广东国民大学教授李次民所著《编辑学》,全书22章,共20万字,主要讲报纸编辑,另有专章讨论杂志。这是“编辑学”概念最早在中国被提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出版界的注意,但当时并未能开展起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界认识到编辑工作是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环节,把“编辑学”重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提出,立足于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

世纪之交,学界对从“编辑学”这一视角研究现代文学表示出充分的兴趣,此类成果通常用两个学科领域的视野来考察,在文学类与编辑学类学术期刊上均有收录,研究进入了更为成熟和丰富的阶段。

① 马以鑫:《〈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② 高恒文:《〈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万莲子于1999—2001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①首次正面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视域——编辑出版。万莲子通过对“五四”时期、“左联”时期及抗战时期三个时段里编辑出版行为特征的分析,考量其在现代文学发生场中的动力机制、作用以及在文学史中的文化审美意义,指明了编辑出版行为的中介位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例如“左联”时期文人受控于经济动因和社会政治理想,致使编辑出版功能的职业化成为必需;抗战时期“政治化”主潮使得编辑行为中的市场因素逐渐淡出等。作者同时结合“现代性”问题论述,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新意与创造性,但其论述过程中选取的例证、阐述的角度均值得商榷,分析力度也略显不够。此后涌现了诸多以现代文学编辑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文章,对编辑理念、刊物编排与文学导向的关系进行了纵深思考。《现代》杂志因其与“现代派”的密切关系,推行兼容并蓄编辑方针的开放姿态以及对文学的单纯政治化走向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学者们探索的热点。^② 研究文章通过对施蛰存的编辑理念的考察,分析了《现代》杂志中立客观的态度、现代的思想以及读者、编者间良好的互动关系等特色。董丽敏论析《小说月报》编辑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

① 万莲子:《论“五四”时期文学运动中的编辑出版行为》,《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万莲子:《“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万莲子:《“抗战与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暨南学报》2000年9月。

② 施蛰存与《现代》杂志的相关研究文章包括:张生:《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看〈现代〉杂志的特征》,《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易文翔:《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李欧梵、沈玮、朱妍红:《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黄忠来:《论施蛰存的编辑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李金凤:《施蛰存和〈现代〉杂志》,《编辑学刊》2003年第2期。

一事的系列文章亦是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① 文章认为,沈雁冰在编辑理念上对于“现代性”理想急功近利的追求,使之提供的内容与市场需求之间明显断裂,导致读者群的流失。郑振铎受商务印书馆之命接替主编职务后,站在文学本体的位置来规范文学,对“整理国故”与“诺贝尔文学奖介绍”这两个栏目充分重视,将沈雁冰的激进做法改成了温柔敦厚的路线。《小说月报》通过撤换主编的方式,实现了一种隐晦的努力,试图弥合文学的内在需要与外部现实加之于文学的压力两者间的冲突。

除此之外,大量总结编辑实践的经验、探究编辑活动规律的编辑学研究成果应运而生。虽然与文学的联系不甚紧密,但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另类的视角与丰富的背景资料。比如邵凯云的《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②直接从理解编辑人的角度切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出版,从编辑体例、筹备资料、编选眼光、编辑团队、营销策略等方面详细剖析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功的原因,强调了文学编辑的关键性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秦艳华的《赵家璧的“选择”意识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③,丁丁的《萧乾副刊编辑思想初探》^④等。

① 董丽敏的三篇论文分别为:《想象现代性——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现代性的异响——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② 邵凯云:《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 秦艳华:《赵家璧的“选择”意识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编辑学刊》2007年第1期。

④ 丁丁:《萧乾副刊编辑思想初探》,《编辑学刊》1998年第4期。

综上所述,“文学编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这一课题已经自成体系,从文学编辑对期刊的政治文化倾向的调控入手,探索并分析了编辑理念和实践与期刊组稿、图书编纂、文学导向的关系,但是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仍有较大的局限性,亟待深入研究和缜密梳理。从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课题的学术增长点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目前对文学编辑的研究通常局限于编辑个人或群体对某一本文学刊物或某一文学流派的影响,涉及政治文化倾向、稿件的选择与编排、对待市场与读者需求的态度等。需要追问的是,文学编辑的选择对某个特定时段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及典型性特征是否有影响?时代政治时势究竟为文学生产与出版制造了怎样的氛围?这一时代文学的主体特征在编辑的影响下发生了哪些变化?编辑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其次,现有研究的重点常常落在文学编辑在文学传播及读者接受两方面的关键性作用,而忽略了其在文学生产过程各环节中扮演的角色。文学编辑审时度势后采用了怎样的文本策略均衡政治导向与文学创作、塑造与传播文学作品、引导大众的审美趣味?具体而言,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与处理方式上、文学体式的推行上、文学作品的传播上及文学的读者接受上,编辑都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对此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考察将深化对文学编辑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二、选择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编辑作为具体考察对象的意义与价值

基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本书选择上海完全沦陷时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的文学编辑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编辑学”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视域,但是将其落实到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尚属空白,本书将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一些创新性的探索,丰富现有的沦陷区文学研究成果。

在“二战”后的中国,日据时期的各种道德选择长期以来被简化为泾渭分明的两极——爱国者的舍身反抗与汉奸的卖国求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为意识形态所制约,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衡量文学的唯一或主要价值尺度,从而将这时的作家作品简单定性,或完全否定或有意忽略。新文学史家黄修己曾指出沦陷时期的文学至今仍是一个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某些作家、作品应如何处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这一政治地域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将大幅度提高整个新文学史的编纂水平。^①虽然人为的政治禁忌阻碍了国内文学领域的探索与总结,但中国台湾、美国的学者认识到沦陷背景下的作家作品应当是“抗战文学”甚至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启动了对中国沦陷区文学的研究。1980年,具有开拓意义的两部专著相继出版:中国台湾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及美国耿德华(E. Gunn)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前者可以视为较详尽的资料汇总,分三卷介绍了南方伪组织的文学、华北伪组织的文学以及东北伪组织的文学。每卷内容的安排体例一致,包括伪组织的时代背景、伪组织的文艺活动概况、伪组织的文艺特征以及伪组织的文艺作家。然而,作者收集的原始资料错漏百出,仅仅满足于表象的罗列,缺乏全面、客观的分析与把握,甚至将当时文坛上

^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

活跃的作者悉数归入“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政治判断有失偏颇。后者通过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归纳了战争时期北京和上海的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并希望“将文学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作品上来”。

《被冷落的缪斯》的问世开启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有不少西方学者循此方向进行研究，而其中以有关上海的研究居多。究其缘由，与外国租界在上海历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相关，对于租界的记录、报道和回忆又以西方语言为主，且能够在欧美档案馆里找到，这种便利助长了外埠学者对战时上海研究的兴趣。以1997至1999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为例，每年都有几篇论文以沦陷时期的上海文艺为主题。耿德华提到李健吾、文载道等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在傅葆石(Poshek Fu)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傅氏将上海的作家和文人对日军占领的反应归纳为三类——“隐”“忠”“降”，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并分别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作为代表。该书的贡献在于采用传记式的研究方式，详细描绘了知识分子选择的复杂性，象征性地展现出在黑暗的沦陷时代下，为了生存而导致的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正是基于政治态度上的暧昧性，沦陷区里的知识分子或普通民众都无法避免的暧昧性，决定了我们对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来区分，应当充分考虑到政治压力、甚至极端恐怖对文学形态的干预。此外，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一书以上海的作家和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且涵

盖的时期包括沦陷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视为相关研究。

西方学界普遍肯定了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潜力，发掘并重新评价了日据时期活跃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开拓了新的视野和发展空间。这些成果对中国内地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某种触发和推动的作用，一批初步成果相继问世，如胡凌芝的《蹄下文学面面观》、冯为群等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申殿和等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20世纪90年代是内地沦陷区文学研究深化期——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沦陷篇》，徐迺翔、黄万华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等一批专著应运而生。研究以丰富的原始资料，详尽论述了几百位被长期忽略的作家，考察了文学出版社、文艺社团、文艺口号以及文艺论争等史实，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那一特殊时空中文学的历史。这批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沦陷区文学的意义，认为沦陷区文学的主体一直顽强地沿着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路径迂曲地生长，蕴含着无法扼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要素。沦陷区文学就此登堂入室，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大都开辟章节专门论述沦陷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因此有了重大改观。学者们端正历史主义态度，设身处地分析沦陷区作家的生存境况以及他们处在两难境地中的言说压力，实事求是地肯定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焦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沦陷区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公正地认定与评价。在过去文学史中被忽略或否定的作家被逐步发现、深入挖掘，有的甚至形成了“风评”的潮流，比如对张爱玲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张爱玲的小说、散文，甚至其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数不胜数。二是对于中国沦陷区文学期刊全面、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上海沦陷时期的刊物。日伪一向奉行严苛的文化政策，禁绝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的作品，“焚

书坑儒”的事情时有发生。正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以集体沉默作为对抗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形下,若干商业性杂志社挺身而出,兼营出版工作。商业性杂志处于商业空间中,存在于殖民统治的缝隙,政治监控在此缝隙内相对松懈。各种文学力量在以期刊构成的言语空间里控制文学话语权,故而文艺类商业期刊收录的作品直接展现了沦陷区文学的面貌与特征。封世辉的《华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1993)^①、《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1994)^②两篇论文最早搜集、汇总并梳理了有关华北、华东沦陷区几乎所有的文艺期刊资料,分时段、分地域、分类别介绍每本杂志的起止时间、编者与内容构成并简要评价,为后来者继续研究提供了索引与线索。汤哲声的《论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方型刊物”》选取分析刊物的视角论析上海沦陷时期文学,认为 40 年代上海刊物的价值标准和艺术趣味正表现出当时文学的特点。作者从价值取向、春秋笔法、文学新人和商业操作四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分析,然而每部分之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流于松散和表面化。李相银的专著《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则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无论是引导创作潮流还是召集创作队伍,都是通过文学期刊来实现的。他将当时的期刊分为《古今》型、《杂志》型与《万象》型三种,着重探究了编辑思路、创作群体的构成与心态,以及期刊对当时文学的规范作用,发掘文学现象背后的生产细节,对解读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提供了新的维度和新的收获。此外,还有一些对某本刊物的专门研究,专著如韩国学者申东顺的《在“说”与“不说”之间——上海沦陷区杂志〈万象〉研究》、王军的《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

① 封世辉:《华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② 封世辉:《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 年第 1 期。

志研究》以及涂晓华的《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等,均认为文学期刊构建了文人在特殊时代里的言说空间,记录了诸多文学生产的细节,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学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文学编辑在确立期刊的政治立场、编辑思想、文学倾向、商业运作等各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本课题的研究重心。

第二,本课题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活跃的文学编辑,不包括上海“孤岛”时期日军占领区(1937年11月—1941年12月)的文学编辑以及台湾、东北、华北沦陷区的编辑,是有充分的考虑的。首先,上海“孤岛”时期日军占领区的文艺期刊寥寥无几,含文艺的杂志总数不及公共租界四分之一。同时,“十之八是画报、电影、戏曲之类的娱乐性杂志,剩下的十之二中一半多是鸳鸯蝴蝶派刊物,再剩下的,一半多又是含文艺的综合刊物,纯文学的新文艺杂志只有两种而已”^①。可见这一时期日占区文艺刊物的目的是营造日伪统治的“升平”景象,迎合小市民庸俗趣味、苟安心理,瓦解反抗救亡的精神意志,几乎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反观上海完全沦陷(1941年12月9日—1945年8月15日)这段时间,日伪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方面虽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统治手段,当地新创办的含文艺内容的杂志仍大幅增长。虽然不乏影剧画刊与“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但整个上海文坛出现以新文学为主的局面,杂志上刊载了相当多有价值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这与文学编辑群体的积极作用密切相关,他们带着镣铐跳舞,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致力于传达中华民族的声音。文学编辑尝试通过各种文本策略迂曲地表明文人的理念

^① 封世辉:《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